

【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

HANGUOJUN

韓國鈞

谢静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从晚清名臣到抗日楷模
HANGUOJUN

韓國鈞

谢静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韩国钧 / 谢静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3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5672-0821-6

I. ①韩… II. ①谢… III. ①韩国钧 (1857~1942)
— 传记 IV. ①K83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0313号

书 名	韩国钧
著 者	谢 静
责任编辑	施 放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72千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821-6
定 价	22.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 炎

委 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级市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做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目 录

引 子	1
-----------	---

早年岁月

生于乱世	6
“以记诵为苦”	9
学教西寺	12
秀才功名	17
中举前后	21
幕府历练	26

知县起家

棘手的开局	32
县任作为	36
跨府称道	46
清化镇的四品官	49
路矿交涉	52



访问日本	59
宦游南北	63
粤省练兵	65
二见慈禧	68
东北大鼠疫	72

封疆北洋

转身民国	77
“礼”送张勋	87
兵灾善后	91
赴皖前后	94
励图皖治	102
冷眼观帝制	107
二掌苏政	112
700万新公债风波	117
“消防队员”	124

林下紫石

生日避客	139
文化工程	142
泰源盐垦	146
鸟出樊笼	153
受困如皋	158
生命的抵押	163

抗战楷模

结交陈毅·····	170
名誉议长·····	182
最后的悲壮·····	188
身后哀荣·····	191
韩国钧大事年表·····	199

引 子

“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海瑞的诗。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74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

这“三不”的评价对于270年后出生的韩国钧（字紫石）同样合适。嘉靖的举人与光绪的举子虽都在40岁左右入仕，又都能锐意兴革，居官清廉，出污泥而不染，香清溢远。海瑞遭弹劾改官，民众闻之号泣载道；紫石卸职安徽巡按使时，“焚香跪者满途，穷民顶香者不下两千人，至大街，香案盈市，几乎无家不设”。但韩国钧终究不是海瑞。

比较起来，海瑞的目光更远大些。海瑞中举的次年（1550），即向朝廷上《平黎策》，希望开道立县，以安定乡土。韩国钧则在任内，恪尽责守，施以仁政。说来巧的是，一次偶遇，竟萌动了—个孩童“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的想法。韩国钧少时见左宗棠着黄马褂，端坐舟中，威风凛凛从门前运河经过，遂“以为莫大之荣”，自愧“不能以先王之



义，胜富贵之荣”。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功名思想，是一代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博取人生的直接动因，韩国钧岂能例外？《孝经》曰：“扬名显亲孝莫大焉。”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功名之念，浸入国人的精髓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圣贤之书；二是具体而生动的生活体验。感性的东西往往来得更加直接深刻而使人终身难忘。

韩国钧的“不怕死”与海瑞亦是有别。1909年冬天，满洲里发生大鼠疫。疫区道殣相望，尸骸枕藉。医务人员时有染病身亡的，同僚们都劝深入疫区的韩国钧“勿入为宜”，当心染病。他置生死于不顾，仍频繁来往于疫区，为民操劳。海瑞不畏死，敢批龙身之逆鳞。他骂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妾，准备慷慨赴死。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其实也是忠君的表现，为的是江山社稷啊！而韩之忠君近于愚。

韩国钧任永城知县时，入不敷出，要靠向友人借贷，才能勉强维持县衙支出。民国初年，大儿成婚筑屋，也要向亲友借钱。从现存的韩国钧故居的规模，可以想见当年两任江苏最高行政长官的封疆大吏是不敛财的官。抗战爆发，其家眷的生活甚至要靠苏北行政委员会拨公粮来维持。

万历十五年（1587），海瑞死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韩国钧在帝国礼崩乐坏的风雨中，少了海瑞的奇特、“怪僻”和执拗。在体现贤臣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时，韩国钧的择善而从，雍容宽厚的本性显现出来。韩国钧宦海四十春，虽有进退，但无大的起落，就是这种性格使然。有道是：性格决定人生。他奉行的“合则留，不合则走”的生存哲学，极大地减缓了人生旅途的颠簸。当然，作为官场资深的官僚，韩国钧又完全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辛亥革命，帝制虽然消亡，但政权的飘忽无定，权力的争斗无休，给智者一个窥测方向，待机而作的“缓手”。贸然行事，最易酿成大

错。袁世凯电令韩国钧赴京，公“不欲于此纷扰之时再赴北京”。并非对权力心灰意冷，而是权居朝野之间，以退为进；退一步，是为将来进两步。他选择在苏省程都督（德全）幕中襄办军事文牍，及时掌握时局动向，决定进退取舍。他阳求不欲，阴为向袁大总统待价而沽：确定军（都督）民（行政）的权限，否则不就。在得到袁的电令“遵照划一官厅组织法办理”后，才赴苏州接任。

当然，从总体说来，韩国钧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政治的人。军阀当政，文人出身的行政长官，又能有什么大作为？陶菊隐一句“省长是督军的媳妇”点破了北洋时期督军与民政长（省长）的主从关系。幸好，韩国钧明白世风如此，不依附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判断与努力，去消解头绪纷繁的争执，只能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

韩国钧接任江苏民政长时，张勋督军已将全省60个县知事，任命了54人，48个税所长，任命了45人。这是明显违背了交接之前袁大总统明确的军民权限的。韩国钧推翻成命，不用说与张勋关系难以摆平，即是已被任命的官员也会不满。此时，韩国钧擎起“中庸之道”的法宝，再次摆脱尴尬。只将年未滿20岁的无锡知事更除，余则照旧。当然韩国钧话还是挺硬：“已任知事而贤，余方褒奖之不暇，否则即余所委派亦复不能姑容。若税所则以此额为标准。”张勋对此等类似“下不为例”之语当然没有意见。

韩国钧生命体中的超凡悟性，也使他能进退裕如。在对官场有足够认识之后，在升迁的失意之时，他能坦然。他说：

“功名者机会为之也。机会无常。有时人赴机会而来；有时机会亦赴人而来。”50岁以后的韩国钧读老庄，又一心向佛，在混沌的世事中，添了许多的超然与淡泊。

他的智慧与才干在对外交涉中更显著。河北矿务局任上，在与英国福公司的较量中，拒绝贿赂：“韩某非图贿者，汝



以贿行，浅之乎视余矣！”在“红黄”界问题上，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合同议定后，允许英国人办的事，他就不再留难。把“大义”与法律精神统一起来，不偏执在抽象的道德轨迹上，同时赢得对手的尊敬。在满洲里大鼠疫与日本人的交涉斗争中，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成功地抑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击破其借口侵吞南满铁路的计划。他兢兢业业的理事作风，沉雄善断的组织才干，既有坚持原则的坚定，又有与对手沟通融洽关系的斗争技巧，同样受到日本人的敬畏，被日皇授于三等旭日勋章，当然奏准后方才接受。

有人评说韩国钧是“中庸集大成者”不是没有道理，但更重要的是他能顺乎潮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不迷失方向，这才在40年的宦宦生涯中不被淘汰。他作为前清重臣，被奉赏头品顶戴，对清王朝乃至延绵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应当充满留恋。辛亥革命时，各省光复，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窃权，宋教仁为人狙击……在历史变幻的迷离中，为避“变乱”和“纷扰”，他辞去吉林民政使，绝意仕进，以冷眼观世变。但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他又坚决反对。任安徽巡按使和江苏省长时，因“党争剧烈，军阀侵权财政，天下骚然多事”，采取了“洁身计”，辞去本兼各职，退隐居里。

退隐后的韩国钧并没有在诗酒中消磨时光。他关心桑梓，热心水利，开办实业，救灾赈济，修史编著，居乡问政，深得民心。

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积极拥护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奔走呼吁国共合作，反对反共摩擦，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日。最后身陷日伪包围而坚贞不屈，严词痛斥敌伪的威逼利诱，拒绝出任伪江苏省省长，在忧愤中溘然逝世。

韩国钧一生任事教育、民政、矿务、军事、外交、水利、卫生等方面，而每司一职，均成效可观。为官40年，从慈禧

太后、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到共产党，异代各方，咸为嘉许。身后又备极哀荣。1943年以紫石命名海安县境。解放后，刘少奇、周恩来对其后人倍加关爱。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

宽厚仁爱的家族传承（清道光末年，海安大灾，其祖拆卖主屋三楹，换米麦，粥赈饥；其父好善尚侠，待人和，接物诚，雅好文学），清正廉明安贫乐道的君子特征，择善而从的大局观，成就了这位乱世名臣的清誉。

对于回原籍闲居的海瑞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所寄，就是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心力为国尽忠为民服务。官场的终结无疑是他事业的终点。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填补心灵的缺憾了。加之一月内妻妾双亡的家庭疑案给善于以道德评判的国人，特别给他的政敌以可乘之机，杀伐得他无回天之力。

韩国钧一生不二色。退隐后的16年间，在事功方面完善和修练他最后的人生，把丰满和完整呈现出来。这是韩国钧的独特之处，也是黑夜星辰永具光泽的所在。

笔者无意比较海瑞与韩国钧孰优孰“劣”。不妨说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韩氏却是一个脚踏大地、“收放”自如的智者。

历史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活动形成的轨迹。在漫漫的长夜里，中国的天空出现过无数闪亮之星，我们忠实地记写他们，是让历史在盛衰荣辱中，昭示我们民族艰难前行中不屈的精神。

昨夜星辰，永远闪烁在历史与现实的天空。